

# 家世地域與漢唐宋明的朋黨

雷飛龍

近代西洋有些學者，認為政治上的領導階級，常是隨同時代需要與人才供應的變遷而流轉的，故有所謂「優秀份子流轉」(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之說（註一）。在舊的「優秀份子」勢力猶存，而新的「優秀份子」的勢力已起之時，雙方為爭競領導權力，常常發生衝突，引起朋黨之爭，甚至引起革命（註二）。例如我國在春秋戰國之際，國君每因舊有的優秀份子——貴族，欠缺富國強兵的智能，不得不引用游士，游士成了新興的優秀份子。然而，貴族是不甘心自己的領導權力轉入游士之手的，因此常常發生衝突，秦貴族之誅商鞅（註三）。楚貴族之殺吳起（註四），就是兩個著例。

漢高祖以平民崛起而有天下，舊的貴族雖被打倒，然功臣則為新的貴族，他們也要壟斷政治權力。呂祿呂產以外戚起而掌握軍政大權，就和功臣們引起衝突，於是有所謂「諸呂之亂」。後來又有一股新勢力從文士中發生出來，這便是賈誼晁錯之流。他們文學才智，受到天子賞識。文帝「欲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註五）。於是文帝貶賈誼為長沙王傅，終不得用其才而死。晁錯得幸於景帝，申屠嘉欲殺之，竇嬰亦惡之，卒藉吳楚七國之變，使其黨爰盡言於景帝殺錯（註六）。直到武帝之世，功臣列侯死亡略盡，於是公孫弘等纔有出頭的機會。

這時，功臣集團的中央政治壟斷勢力雖已消滅，但在地方上壟斷鄉曲的豪強勢力尚存。後漢書卷一〇七酷吏列傳序有云：「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並兼者則凌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漢高祖雖用劉敬之言，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十餘萬口於關中，但承平日久，新豪族又生，彼等憑其財富，始則兼併土地。由於土地所有權集中，因此武帝時董仲舒即已建議限田，其時設置的監察地方的部刺史職掌問的六事，第一就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註七）。因為董仲舒建議的限田，武帝並沒有採納，土地集中的情形並無改善。哀帝時，師丹又建議限田，然因外戚及

倅臣的反對，亦未實行，卒至釀成王莽的改革。

王莽的改革過於煩瑣，引起大亂，各地豪族，有的起而反抗，有的合族自保，光武中興，得力於豪族者甚多。於是豪族在經濟勢力之外，又取得政治勢力。通過有利於權豪的州郡薦舉和公卿辟除的取士制度，這種政治勢力，復可以傳之子孫，是以豪族又變爲世族。汝南袁氏自袁安起（註八），弘農楊氏自楊震起（註九），都四世三公。不過，由於東漢的辟召選舉，還採取名譽，寒門如果經明行修，還是爲世所重，有其上進之路。如當時最受清流敬仰的黃憲和徐穉，都家世貧賤，亦都被舉孝廉，政府辟召，不過他們未就罷了（註一〇）。因此，東漢並沒有世族與寒門的對立。黨錮之禍，只是清流與濁流的對立。雙方都有豪族，也有寒門。茲就雙方的家世，試加說明。

在清流方面，其領袖人物竇武，爲竇融玄孫，父奉爲定襄太守（註一二）。陳蕃，祖父爲河東太守（註一二）。劉淑，祖父稱爲司隸校尉（註一三）。李膺、祖父修，安帝時太尉；父益，趙國相（註一四）。荀昱，其叔荀淑，有名於時，爲李固李膺所師宗，淑子八人，時謂之八龍，昱爲沛相，弟曇爲廣陵太守（註一五）。王暢父襲，順帝時太尉（註一六）。范滂，父顯，龍舒侯相（註一七）。尹勳，家世衣冠，從祖睦爲司徒，從兄領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註一八）。羊陟，「家世冠族」（註一九）。張儉、「父成，江夏太守」（註二〇）。岑晊、「父像，南郡太守」（註二一）。陳翔、「祖父珍，司隸校尉」（註二二）。孔昱，「七世祖霸，成章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註二三）。這些當然不是世家，就是豪族。但是，名列八顧的郭太，家世貧賤（註二四），亦爲清流領袖。名列八及的檀敷，和名列八厨的度尚，都家世貧寒（註二五）。可見清流所標榜的，並不只是世族，也有寒門。

在宦官及其黨羽方面，宦官的出身，可能並非世族，但在其得勢之後，便也和其他豪族一樣，可以利用薦舉辟召等制度，將其兄弟姻戚，布列要路，一變而爲豪門世族。例如曹騰以參與定策立桓帝，封費亭侯；其弟鼎，爲河間相（註二六），其養子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萬，位至太尉（註二七）。因爲曹嵩有錢有勢，所以其子曹操二十歲即舉孝廉爲郎，董卓之亂，並得散家財起兵（註二八）。又如單超、左悊、具瑗、徐璜、唐衡五人，以誅梁冀功封侯，並稱五侯。皆養其疏屬，或乞嗣異。

姓，或賈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宰州臨郡。單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左愷兄稱爲太僕，封南鄉侯，弟敏爲陳留太守；具瑗兄恭爲沛相，徐璜弟盛爲河內太守，兄子宣爲下邳令（註一九）。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王甫之子萌爲長樂少府，吉爲沛相（註三〇）。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註三一）。是時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殷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註三二）。以這些宦官的聲勢，稱之爲豪門，是毫不爲過的。至於附託宦官爲害人民的南陽大猾張汜，宛陵大姓羊元羣，河內張成等，旣皆以大兒稱，自然也是豪族。

由於東漢黨爭的雙方都是豪族，所以楊聯陞先生認爲：東漢的黨爭，只是豪族中清流與濁流兩個集團的鬭爭（註三三），因此這次鬭爭，並無新舊階級的衝突意義存在。

世族的勢力，經過魏晉九品中正制度更進一步的培植，形成政治上的獨佔力量，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就是九品中正制度所協助造成的結果。門閥觀念，亦由此而產生。新唐書卷一九九柳冲傳記柳芳之言云：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偽。……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

這時所謂門閥，大致是以祖宗官職高下爲標準，柳芳說：

「郡姓者、以中國土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新唐書卷一九九柳冲傳）其時北朝著名的郡姓是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臨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通稱七姓（註三四），或稱五姓。」

但是，世族之所以爲世所重，陳寅恪先生以爲並不端在其祖宗的高官厚祿，而且亦在其承述於先代的家學門風，他說：「所謂士族者，其初並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爲其唯一之表徵，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如范陽盧氏者，山東士族中第一等門第也。然魏收著魏書，其第四七卷盧玄傳論云：『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述，爲世盛門。其文武功業，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其實伯起此言，不獨限於北魏時之范陽盧氏，凡兩晉南北朝之士族盛門，考其原始，幾無不如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五十三）

惟其如此，所以世族到唐代雖然世代久已衰微，全無冠蓋，如其家風禮法未盡淪替，子孫猶負世望。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仍以崔幹爲第一（註三五），太宗雖抑之第三，但仍爲士流攀附的對象。又如高宗朝宰相李義府，本瀛州饒陽人，而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註三六）。薛元超亦高宗朝宰相，以不娶五姓女，爲平生之大恨事之一（註三七）。武后時任中書令的李敬玄，「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註三八）。而王鍔自言太原人，附太原王鋗爲從子，以婚履自高」（註三九）。令狐楚：「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註四〇）。這些「自言」的地望與族望，不一定實在，但是見其攀附之情。從這些事實看，可知世族在唐代仍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勢力，他們無疑是所謂優秀份子。

然而，自隋代廢止九品中正制度，改以科舉取士，並自高宗時起特見尊重之後，由科舉出身的進士，逐漸成爲新興的優秀份子。其所以特見尊重，則又有特殊原因。德宗時史官沈旣濟有云：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選，因循日久，寢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立身行己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宜，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故忠賢隽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姦無良者或有焉」。（通典卷十五、選舉典三）

然而，唐代進士考試，係採通榜，試藝本身不關重要，而採取聞望，故先達之吹噓，名流之推薦，頗與取錄與否攸關，因此舉

人不恤卑躬屈節，求知於先達；而浮薄奔競，是以成風。代宗時楊綰即言：

「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即詩賦），……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因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舊唐書卷一九楊綰傳）

後來李德裕鄭覃之反對進士，其主要論點仍爲楊綰所說的浮薄與結黨二端。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會昌四年末載李德裕之言云：「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尙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目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

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云：

「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旣及第，綴名通行，詣主司第謝，……又有曲江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主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進士的崇尚文辭，與北朝的山東舊族所尊奉的經術，已經不同；而浮薄無行，尤使重視禮法的山東舊族深表不滿；加之結黨擅權，更使日就式微的山東舊族大受排斥。李德裕鄭覃同爲北朝數百年來顯著的山東舊族，而又能保持其原有的家學門風，其挺身而與進士階級相抗爭，實爲新舊統治階級遞嬗，亦卽所謂優秀份子流轉」過程中爭奪政治權力的一幕衝突。

試將李德裕及牛僧孺黨人的家世出身與作風，作一比較，以觀兩黨的異同。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略云：

「李德裕，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以蔭補校書郎），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以蔭補校書郎」及「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皆新傳之文）。又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三、盧肇爲進士狀頭條云：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嘗武（李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

關於鄭覃，舊唐書一七三鄭覃傳略云：

「鄭覃（滎陽人），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文宗）尤重之。嘗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專學，校定六經，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位至相國，所居纔庭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

李德裕、鄭覃皆出身世族，由蔭補官，但其引用或與之厚善者，則不盡出身世族；且以其時仕進無他途，亦多由進士以發身，然必有一共同之點即須堅正有行而不浮薄。例如陳夷行，潁川人，進士出身，然性介特，開成中與楊嗣復，李珏同官宰相，而惡其所爲（註四二）。李紳，本出趙郡，高祖敬玄武后時爲中書令，父歷宦南方，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舉進士，以文藝節操見用（註四三）。路隋，其先陽平人，父泌，通五經，以孝悌聞，以王事沒吐蕃；隋亦以孝著，舉明經，有學行大度，史稱其得君子之中庸而常居之（註四三）。李同，李唐宗室，舉進士，強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註四四）。李讓夷，系本隴西，舉進士，「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註四五）。鄭肅，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力學有根抵，舉進士爲太常少卿，博士有疑義往咨，必據經條答，臨義不奪，挺挺有大臣節（註四六）。崔從，系出清河，少孤貧，舉

進士，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贊之」（註四七）。崔瑨崔珙兄弟，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頤，舉進士，累官少府監，同州刺史，頤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之東漢荀氏八龍（註四八）。瑨第進士，方介有器蘊，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會昌中爲相，以兄瑨喪被疾解官。（註四九）。崔鄆兄弟，李德裕與之素善，鄆第進士，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四世總麻同爨，兄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鄆、鄆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爲時名德。宣宗嘗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註五〇）。薛元賞，出身孤寒，亡里系所自來，李德裕用爲京兆尹，懲治惡少，折戢禁軍，百姓賴安，新唐書列爲循吏（註五一）。其他如王質、沈傳師、韋灌、李德裕與之厚善，皆家風整肅之名德君子（註五二）。柳仲郢與韋溫，雖與牛僧孺相厚，李德裕以其堅正中立，亦尊禮而重用之（註五三）。至若封敖雖以文辭爲李德裕所重，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爲，德裕亦不能加以大用（註五四）。

至於牛黨，家世並不相同，如李絳、李固言、李珏，則出自趙郡李氏；崔鉉亦出身博陵崔氏，李逢吉系出隨西，李宗闕、李漢，則爲李唐皇朝宗室，魏謨則爲魏徵之五世孫，杜悰、杜牧，均爲杜佑之孫，楊於陵、楊嗣復父子，及楊虞卿楊汝上、楊漢公兄弟，皆出身弘農楊氏；張仲方則爲張九齡之裔孫；令狐楚，令狐納父子，則自稱爲令狐德棻之後，牛僧孺稱爲隋代大儒牛弘之後；白居易、白敏中，自稱爲北齊司空白建之後（註五五）。然牛黨中人，所言家世，如令狐楚、牛僧孺、白居易等，皆不可靠；令狐楚並非令狐德棻之後，新唐書七十五宰相世系表歷歷可證；牛僧孺或言爲牛仙客之後（註五六），而依新唐書七十五宰世系表，既非牛仙客之後，其自言爲牛弘之後，亦有問題；設如杜牧所作牛僧孺墓誌銘所云：牛弘後四世之牛鳳及爲其高祖，牛弘後五世之牛休克爲其曾祖（註五七），何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不予採信，而列鳳及爲別支，於牛休克之上則兩世從闕？豈非對杜牧所云有所存疑？至於白居易之祖先爲誰，因其自言者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者不同（註五八），其有問題，陳寅恪先生已經早予指出（註五九）。不過，牛黨要人，除杜悰外，餘如李絳、韋貫之、楊於陵、楊嗣復父子，李逢吉、令狐楚、周墀、孤納父子、錢徽、牛僧孺、李宗闕、楊虞卿、楊汝士，楊漢公兄弟，李固言、李珏、杜牧、白居易、白敏中兄弟，崔鉉、周墀

、馬植、魏謨、李漢、蔣仲、畢誠、張仲方等，皆係出身進士，其爲新興的統治階級，自無疑義。

李德裕鄭覃不滿於進士階級者，爲其結黨與浮薄。關於進士結黨一事，拙作「爭取仕進與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一文（載幼獅學誌第四卷合刊本），曾加研究。當時一般人所稱的朋黨，即指進士所結成的牛黨而言（註六〇）。關於進士中人的浮薄，一般即爲家風不謹，其中一端爲風流好伎樂，陳寅恪先生云：

「唐之進士一科，與倡伎文學有密切關係，孫棨北里志所載，即是一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六十八）。

牛僧孺李宗閔爲相，每宴，與平康坊倡妓同席酣飲；牛僧孺出鎮淮南日，開六七重坊門，夜宴至三更而散，又過李聽宅令出妓樂。李宗閔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辦，兩縣令官吏因緣求取，所斂至厚。（註六一）。牛黨中的才士杜牧，尤其好色，太平廣記云：

「牛僧孺出鎮揚州，牧之節度書記。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空中，街衢巷陌，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出沒馳騁其間，殆無虛日。後繁華夢醒，懺悔艷游，乃作遺懷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其從兄杜悰，無才而居高位，時人謂之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官寄寓，貧困尤甚，未嘗拯濟，至於節臘，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註六二）。其祖杜佑，雖爲名相而兼通儒，而昇嬖妾爲正室，雖親族子弟言之，不從，爲時論所非（註六三）。可見杜氏，雖號稱舊門，而實非勝族。又如牛黨另一才士白居易，號稱家貧，至以翰林學士而兼京兆戶曹參軍，以圖增加收入，而家中却養歌妓數人；又其母墮井死，而作新井詩，遂坐不孝貶官（註六四）。白居易以詩聞名，然杜牧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爲，流傳人間，淫言媠語，入人肌骨（註六五）。又如李漢，亦以家行不謹貶官（註六六）。足證牛黨中人多家風浮薄，和李德裕黨多以堅正厚重見稱，後房無聲色之娛者，殊有不同。

至於李黨之中亦多進士出身，而牛黨之中亦有系出山東舊族，兩黨頗有混同之現象，似乎所謂牛李兩黨之爭爲新舊階級的對立，亦即進士與門第的衝突者不能成立。依陳寅恪先生之意，牛李兩黨既產生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

，自不能免。蓋以其時仕進無他歧，不論家世新舊，除有門蔭可恃者外，均不得不假進士以發身；而舊日世族既已淪替，亦自然與新階級漸趨混同，其能與之抗爭者，必其人之家族尙能保持舊有之家學門風，故不滿於新階級的所作所爲，而與之反抗。如李德裕鄭覃之類是也。至於李唐皇室及其他一般士大夫，則處於中立地位，各隨性之所近而分附於兩黨（註六七）。

至王讌唐語林、卷三識鑑類所云：

「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李珏、楊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廷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  
：（錢易南部新書、丁卷所記大抵相同）。

經術爲南北朝以來山東世族傳統之家學，而詞采則爲高宗以後，新進士階級之敲門磚，此因無待解釋；至李黨之陳夷行、鄭覃主張進用孤立之士，而牛黨之李珏、楊嗣復反主張先用有地胄者，似乎與李黨重門第，而牛黨重進士之說不合。則其理由乃在科舉制度取士之後，重進士而輕明經，山東世族之不能舉進士者，轉成孤寒之族；而進士階級利用座主門生同年等關係，勾結朋黨，互相援引，如楊於陵、楊嗣復父子、楊虞卿、楊汝士、楊漢公兄弟，及其後代，均以進士起家，致身通顯，新唐書一七五楊虞卿傳附汝士傳云：

「楊氏自汝士後，貴胄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者率十餘人」。

彼等既已成爲新的世家冠族，自然要崇尚地胄，故拔引孤寒的美德，反而要讓之於李德裕及其黨人了（註六八）。由此，更足見新舊優秀份子流轉的事實。

進士既已成爲新的門第，到唐末即被目爲清流，然經宋全忠白馬之禍，繼以五代的崇尚武力，門第勢力，已漸消滅。到宋代時，由於考試制度遠較唐代嚴格，權勢不能加以左右，世家雖由任子及學習機會較佳，仕進之路稍廣，然寒門仍有由考試發身之機會，故門第不能成爲一種勢力。作爲門第的支柱及表徵的譜牒及鄉貫，已經無人加以重視。陳傅良所謂「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註六九），即爲此一事實的表現。

范仲淹主持的慶曆變法，因爲有限制任子的主張，引起朝貴的反對，故在范仲淹及其反對者的鬭爭中，稍爲有點寒門與世

家相爭的痕迹。例如范仲淹本身世家寒微，早孤，母改嫁，讀書時饑飧不繼；歐陽修亦家貧，父雖進士及第，而官位不高，又早孤，其母至以畫荻爲教（註七〇）。其同黨韓琦之父國華，官最高，僅至太常少卿（註七一）。杜衍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然早卒（註七二）。富弼父言，嘗爲宰相呂蒙正之客（註七三），而仕途不顯。在反對范仲淹方面，呂夷簡祖龜祥，知壽州（註七四）。其從父呂蒙正，太宗真宗朝宰相（註七五）。陳執中之父恕，爲三司使，曾一度參知政事（註七六）；章得象，高祖仔鈞，官至建州刺史（註七七）。家世似乎較范黨爲顯赫。

在王安石變法所引起的黨爭中，主持變法的人，家世似乎都不太顯赫。如王安石的父親王益，僅官至韶州知州，江寧府通判（註七八）。呂惠卿父璿，終光祿卿（註七九）。曾布早孤（註八〇）。章惇父俞，仕至職方郎中（註八一）。而反對變法的人，如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則爲當代名公巨卿。呂公著爲呂夷簡之子，范純仁爲范仲淹之子，司馬光之父司馬池，知河中府，家貲數十萬（註八二）。家世似乎比王顯赫。其實，贊成變法的人，亦不無名公巨卿，如曾公亮父子即是；而所謂「傳法沙門」韓絳，則韓億之子，韓維之兄；執行新法甚力的呂嘉甫，則呂公著之侄孫，皆爲中州巨室韓呂家族中人。李清臣則爲韓琦姪婿；首建免役議的李承之，則真宗仁宗朝宰相李廸之侄（註八三）。總之，新舊黨中，俱有出身望族及寒門的人，似乎兩黨之爭，尚無以門第高下爲其分野的迹象。

明代無門第勢力之存在，其後士風日下，甚至亦不分流品。例如嚴嵩擅權，其家人嚴年，士大夫競稱萼山先生（註八四）。張居正之家人游七，納貲爲官，助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註八五）。在東林與反東林的閹黨之中，亦無家世門第之別。在東林黨方面，顧憲成祖父三代未曾任官；高攀龍祖父爲舉人，曾任縣令，其父國子監生（註八六）。薛敷教之祖應旂，進士，由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註八七）；于孔兼爲金壇望族，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備副使（註八八）。葉向高，父朝榮，養利知州（註八九）。劉一燝，父材，陝西左布政使，兄一焜一焜，俱進士，一焜終右僉都御史浙江巡撫，一焜終兵部郎中（註九十）。孫慎行，外祖唐順之，明代名儒（註九一）。馮琦，自曾祖以下，累世進士；父子履，河南參政（註九二）。孫鑛，祖志高，都御史，父陞南京禮部尚書（註九三）。文震孟，文徵明曾孫，祖父彭，國子博士，父元發衛輝同知（註九四）。以上是家

世比較顯赫的。同時，也有極為貧困的，例如魏大中，家酷貧（註九五）；劉宗周，家酷貧，母遺腹生宗周，携之育於外家（註九六）。至於閹黨中人，有無賴如魏闔本人（註九七）；又如五彪之一的崔應元，亦大興市井無賴（註九八）。而身世顯赫者亦甚多；沈淮父節甫，工部左侍郎（註九九）；魏廣徽之父允貞，兵部右侍郎（註一〇〇）。馮銓父盛明，遼陽兵備（註一〇一）。王紹徽，尚書用賓之從孫（註一〇二）。田爾耕，兵部尚書樂之孫（註一〇三）。可見雙方有寒門，也有世族。在家世方面並無軒輊。至於東林黨及逆案中人的出身，美人哈克爾（Charles O. Hucker）曾加以統計如下（一註〇四）。

出 身 類 别	東 林 黨 人	逆 案 中 人
①進士	一四〇	一六七
②舉人	八	十三
③監生	五	五
④捐貲		
⑤父蔭		
⑥世襲助爵		
⑦軍職		
⑧宦官		
⑨女		
總	一一一	一五三

由上表的統計，可見在出身方面，東林和逆黨也沒有顯著的不同。

以上已將東漢、中唐、北宋、晚明幾個大的黨爭，在家世方面的分野加以分析。我們認爲除唐代的牛李黨爭、似有新舊領導階級——進士與門第的對立現象以外，其他的黨爭，其關係雙方似乎在家世和出身方面，並無顯著的不同，在其爭執的問題中，也沒有涉及家世或出身的事項。

不過，從宋代起，「優秀份子流轉」所引起的衝突，自「新舊門第」上轉移到「新舊地域」上來了。新的地域的人，擠入領導階級者，人數越來越多，使原來居於領導階級的舊地域中人，深感不滿，於是新舊領導階級之爭，即便產生；而地域利益之爭，在政治爭論之中，同時也佔有重要地位。

我們說這種爭執起於宋代，是因爲在漢唐兩代的政治爭執中，既沒有地域利益的問題，而且在黨派的結合上，也沒有地域性的對立。例如東漢的清流黨人，如果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尉爲代表，宦官及其黨羽如以單超、徐璜、具瑗、左悊、唐衡、曹騰、侯覽、曹節、張讓、趙忠、王甫、趙津、段珪及張成、朱並、羊元羣爲代表，則雙方的地域分佈有如下表（註一〇五）。

沛國	汝南	颍川	扶風	河內	河南	郡別	清流黨
朱寓			竇武	陳蕃、尹勳			
			李膺、荀昱、杜密		單超、左悊、羊元羣	宦	
曹騰		范滂、蔡衍、陳翔		張成			
			唐衡、張讓				

太蜀會南東濟太東陳勃安河中魏魯  
原郡稽陽萊鄆陰陽平山平留海間平山郡國

郭太 趙典 魏朗 宗慈、岑晊 王璋  
王暢、張儉、劉表、檀敷、度尚  
羊陟、胡母班  
張邈、王考  
劉儒  
夏馥、秦周  
巴肅、范康  
劉淑  
劉祐  
孔昱、蕃嚮

趙津 曹節 徐璜 段珪 侯覽、朱並  
王甫 趙忠 具瑗

從上表，可見雙方的郡望，大部分是相同的；雙方的結合，似乎沒有地域的因素。

在唐代，由於「唐人修史，例皆不以土斷，而遠取本望，劉知幾爲史官，曾非之，不能革也」（註一〇六）。是故兩唐書列傳所載各人里系，可能並非其真正的生長或生活所在地，由此研究黨派結合與地域的關係，可靠性並不甚高，然以無其他資料可資依據，姑就此作一比較表如下（註一〇七）：

		里系			
		牛		黨	
		趙郡	李	李	黨
魏	清	趙隴西	李絳、李固言、李珏	李吉甫、李德裕、李紳	
州	河	李唐宗室	李逢吉	李讓夷	
博	陵	鄭州滎陽	李宗闕、李漢	李回	
太	原	虢州弘農	牛僧孺、杜悰、杜牧	鄭覃、鄭肅、鄭亞	
平	川	颍陽	楊嗣復、楊虞卿、楊汝士、楊漢公	韋瓘	
原	原	京兆		陳夷行	
崔	崔	魏謨	令狐楚、令狐綯		
琪	琪	崔鏗	白居易、白敏中		
從	從	王茂元			

郴 州

畢誠

扶 風

馬植

汝 南

周墀

吳 郡

錢徽

潤 州

劉鄴

常州義興

蔣仲、蔣係

韶州始興

張仲方

山上表，可見牛李兩黨人物的里系頗有混同。至如牛僧孺、楊嗣復、楊虞卿兄弟及令狐楚父子等牛黨領袖，雖不與李黨中人同籍里，然與李黨亦無顯著不同的地域利益，故雙方朋黨的結合，似乎並無地域性的對立。

宋代的地域利益之爭，是南北之爭。過去由於北方開發較早，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北方都比較進步，統治階級當然絕大多數是北方人。不必徵引旁的資料，只看東漢清流所標榜的人物中，只有一個會稽魏朗，係屬江南人。到了唐代，南方的經濟已漸發展，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就說當時整個國家財政，全靠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註一〇八）。牛李黨爭所牽涉的人物，如牛黨的錢徽、蔣仲、蔣係、張仲方、李黨的劉鄴，都是江南人。唐代的考試，因係採通榜制度，頗受權勢左右；江南人政治上沒有勢力，故舉進士者當然不會太多。到了宋代，江南經濟更加發展，文化亦更進步，宋代考試制度，由於彌封賸錄的結果，已無權勢左右的餘地。在平等的競爭之下，進士及第者，南人即較北人為多。故英宗時，司馬光即請分區定額，逐路取人（註一〇九）。神宗時，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註一〇）。蘇軾亦會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

河東、陝西五路，……得人常少。……願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註一二）。北方人在考試上競爭不過南方人，政治權力自然不免要轉入南方人之手。北方人當然不願意，於是各種詆毀南人的說法，便由此產生。有的人從風土上說南人剽而不重，脆而少剛。宋初，宋景文公筆記卷下云（按宋祁安州安陸人，徙開封雍丘）：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爲人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莊季裕鷄肋編卷上亦云（按莊季裕清源人，今屬山西）：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嘶啜，背地嘶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之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惟賢哲爲能耳！」

因此，南人之進用，多被裁抑，甚至謂太祖有「無用南人爲相」之說。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一云（參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及王楙、野客叢書、卷廿五）：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人爲相』。」

王欽若是宋代第一個南方人爲相的，當時王旦即以其爲南人而加反對。宋史二八二王旦傳云：

「帝（真宗）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歿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晏殊受真宗賞拔，寇準亦謂其爲江外人，而圖加以壓抑。宋史卷三一晏殊傳略云：

「晏殊，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

神宗時陳升之被任爲宰相，司馬光也以同樣的理由加以反對。馮琦宋史記事本末卷卅七王安石變法云：

「升之既相，帝向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曾公亮、陳升之）皆閩人，二參政（趙抃、王安石）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其實，南人之被目爲姦邪或狡險，可能便與其在政治上動受排擠，而不得不運用智術，以求進取或自存有關。因爲他們以智術得到君主寵信，妬忌的人，智術鬪不過他們的人，自然要目之爲姦邪或狡險了。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丁謂（蘇州長洲人），林特（福建順昌人），陳彭年（撫州南城人），劉承珪（楚州山陽人）是王曾所謂的五鬼（註一二三）；除劉爲淮南路人外，其他均江南人。其後被詆爲姦邪的夏竦，籍貫江州德安，也是一位南人；從南人之被壓抑及被詆爲姦邪，似乎便表現出新舊統治階級交替或「優秀份子流轉」中的衝突之地域性。

南人當時不止是新興的統治階級，也是各種改革的先驅。譬如在學術上，便是如此。陳傅良溫州學田記云（參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本朝文物自江南來條）：

「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始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常蹈故之習未化，范子（仲淹）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修）出，而議論文章粹然儒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濂溪）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

。（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十五引）

因爲南人是改革的先驅，而北人則爲保守的重鎮，所以仁宗時的慶曆變法，和神宗時熙寧變法所引起的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黨爭，幾乎就有南人和北人相爭的色彩。試將慶曆變法的主持者范仲淹之黨及其反對者的籍里，加以比較：

## 范仲淹之黨

反對范仲淹之黨

范仲淹·蘇州吳縣

呂夷簡·壽州

杜衍·越州山陰

王拱辰·開封咸平

韓琦·相州安陽

劉元瑜·河南

富弼·河南

劉平·開封祥符

歐陽修·吉州廬陵

韓縝·開封雍丘

葉清臣·蘇州長州

賈昌朝·真定獲鹿

蔡襄·興化仙遊

章得象·建州浦城

尹洙·河南

陳執中·洪州南昌

余靖·韶州曲江

宋庠·安州安陸(徙開封雍丘)

滕宗諒·河南

夏竦·江州德安

石介·兗州基符

蘇舜欽·梓州銅山

吳遵路·潤州丹陽

由此，可知范仲淹之黨大部份是河南人，而反對之者大部分是北人。在王安石變法時，其重要佐助人物如呂惠卿，曾布等，也大抵是南人，其附從者也以江南西路、福建路、兩浙路的人為多。茲分路開列如下，以見一斑：

江南西路：王安石、王雱、曾布、王韶、熊本、徐禧、蕭注、王安禮、鄧潤甫、吳居厚、董敦逸、彭汝霖、何正臣

福建路：曾公亮、陳升之、呂惠卿、呂升卿、蔡確、章惇、蔡京、蔡卞、曾孝寬、楊汲、許將、黃履、章楨、徐繹、林

希、溫益、葉祖洽。

兩浙路：謝景溫、元絳、舒亶、盧秉、沈起、俞充、陸師閔、陸佃、龔源、葉濤、盧策、郭知章、朱譁、吳材、管師仁、錢商、薛昂。

江南東路：李琮、劉拯、董必、汪澥。

荆湖南路：陶弼。

成都府路：王珪、鄧綰、鄧洵武、蹇周輔、蹇序辰、張商英、張唐英、李稷。

潼川府路：安惇。

利州路：蒲宗孟。

淮南東路：李定、張璪、沈季長、崔公亮、張康國、喬執中。

淮南西路：呂嘉問、左膚。

京畿路：韓絳、陳繹、安燾、來之邵、蔡龜。

京東路：李復圭、蔡挺、李承之、石豫、趙挺之。

京西北路：常秩、李南公、楊畏。

河北東路：王廣淵、李清臣。

河北西路：崔臺符、韓璣。

永興軍路：薛向。

而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領袖，如韓琦、文彥博、富馬光、呂晦、呂大防、劉摯、王岩叟等，大概都是北人，其附從者遍及南北，但南方的反對者，態度一般不如北人之激烈，趙抃、范純仁、李常、即其著例。茲將反對王安石變法者分路開列如下：（後來反對蔡京而不反對新法者不在內）（註二一三）。

河北西路・韓琦、韓忠彥。

河北東路・劉摯、王岩叟、劉安世、李之純、李之儀、晁補之、王鞏、龔夬。

河東路・文彥博、畢仲游。

永興軍路・司馬光、呂大防、張舜民、司馬康、李周、韓川、蘇禹。

秦鳳路・趙瞻、張戩。

京畿路・呂晦、王拱辰、韓維、鄭雍、崔鷗、路昌衡。

京東路・張方平、梁燾、馬默、姜潛、李師中、趙彥若、王欽臣、王汾、杜純、李格非、孫諤、李昭坦、商倚。

京西北路・富弼、程顥、程頤、傅克儉、孫固、孫永、朱光庭、趙君錫、謝文瓘、劉唐老、朱光裔、尹材、鮮于綽、種師道。

京西南路・張問。

成都府路・范鎮、蘇軾、蘇轍、楊繪、范百祿、范祖禹、呂陶、李大臨、常安民、任伯雨、陳祐。

淮南西路・呂公著、呂公弼、呂希純、呂希績、呂希哲、賈易。

淮南東路・孫覺、王覲、秦觀、張采、孫升、孫洙。

兩浙路・趙抃、范純仁、范純禮、范純粹、王存、胡宗愈、蘇頌、豐稷、劉述、錢顥、陳舜俞、錢勰、姚勔、顧臨、鄒浩、江公望、周鍔、滕元發。

江南東路・劉琦。

江南西路・李常、劉奉世、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黃庭堅、歐陽棐、余爽、余卡、歐陽中立、范柔中、鄧考甫。

福建路・陳襄、鄭俠、陳次升、林旦、黃隱、陳瓘、陳遁、蘇嘉、吳儔、陳師錫。

荆湖北路・唐介、唐義問、馮京、鄭獬、宋保國。

潼川府路・張庭堅、岑象求。

利州路·鮮于侁、馬涓。

當然，北方人之反對新法者較贊助者為多，除了權力爭奪的因素外，其他因素如經濟情形之南北不同，以及新法施行的地域，如保甲、免役、市易之先行於京畿，方田均稅之先行於京東，亦有關係。對此，已於拙作「北宋新舊黨爭與其學術政策之關係」一文（載本學報第十一期）有所論列，茲不復贅。

至於元祐黨中的朔洛蜀之爭，除了在學術上和政策上的論點不同外，顧名思義即可知其與地域因素有關。朔黨領袖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皆河北東路人；梁憲則京東路人；洛黨領袖程頤、朱光庭，均河南人；賈易則淮南西路人；蜀黨領袖蘇軾、蘇轍、呂陶均為成都府路人。方洛蜀相攻時，朔黨與洛黨行動一致，似乎與地域的接壤，因而學風性格相近有關。

在明代，南方經濟較前更有發展，而北方則以水利失修，經濟益以衰落。就明代賦稅之偏重江南，即可發現此一現象。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十六云：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  
。（古香齋袖珍本第十二冊，頁十八）

這固然是因明太祖恨蘇松等郡為張士誠死守，特別加重其賦稅的關係，但可見南方經濟發展的一斑。由於經濟發展，文風自亦發達。洪武三十年會試，及第者全是南人，北方竟無一人登第。由是引起很大的糾紛，南北地域觀念因而更重。明史卷一三七劉三吾傳略云：

「劉三吾，（湖廣）茶陵人，累遷翰林學士。（洪武）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進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

此次南北分榜，當然係屬特例。至仁宗時，為保障北人取士名額，遂定南人取十分之六，北人取十分之四。宣德正統間，分為南北中卷，南卷取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取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取百分之十。景泰初不分區定額，景泰五年復分南、北、中卷，

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憲成化二十二年，萬安當國，周洪謨爲禮部尙書，皆四川人，乃減南北各二名以益中卷，至孝宗弘治二年復從舊制。武宗正德三年，給事中趙鐸、承劉瑾指，請增廣陝西、河南、山東、山西、鄉試名額。又以會試分南北中卷爲不均，乃增四川額十名，併入南卷，其餘併入北卷，各取一百五十名。蓋劉瑾陝西人，閣臣焦芳河南人，各爲其鄉故也。劉瑾敗，恢復舊制（註一四）。由此，可見地域利益與南北觀念的關係。

✓南北地域觀念，不只在取士名額上發生過重大作用，在用人上的作用尤大。例如明史一七七王翹傳略云：

「王翹（北直）鹽山人，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翹由是益多引北人」。

又如明史一七七姚夔傳：

「初王翹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按夔浙江桐廬人），論薦率能稱職」。

南北觀念，時常成爲明黨結合因素。例如憲成化間，萬安（四川眉州人）爲首輔，與南人相黨輔；其同僚劉翔（山東壽光人），與尚書尹旻（山東人）王越（河南滑縣人），又以北人爲黨，互相傾軋（註一五）。武宗時焦芳以附劉瑾得政，「深惡南人，每退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註一六）。世宗時，嚴嵩擅權，嚴爲江西分宜人，其所引用者，如趙文華，浙江慈谿人；鄒懋卿，江西豐城人；胡宗愈，南直隸績溪人。嵩敗，坐其黨被論者，「前兵部右侍郎（北直）柏鄉魏謙吉，工部左侍郎（江西）南昌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江西）德安何遷，右副都御史（河南）信陽董威，僉都御史（江西）萬安張雨，應天府尹（河南）祥符孟淮，南京光祿卿（江西）南昌胡植，南京光祿少卿（南直）武進白啓常，右諭德（浙江）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江西）新城王材，太僕丞（江西）新喻張春，及嵩婿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人」（註一七）。上述嚴嵩之黨十五人，除袁應樞籍里不詳外，其餘十四人中，十二人爲南人，而七人爲江西籍，可見明代的地域觀念，除南北之外，還有省籍觀念，亦頗具勢力。

明代的省籍觀念，和取士制度中的鄉試，似乎頗有關係。鄉試自洪熙元年起，是分省定額的。因此明代的同鄉大抵皆以省

爲範圍，並爲援引或排斥的依據。例如：

「成化五年，（吏部）尙書李秉罷，商輶欲用姚夔（按商浙江淳安人，而姚爲浙江桐廬人），彭時欲用王概（按彭時江西安福人），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寶逐秉，喧謗於朝，時稱疾不出。侍讀尹直（江西泰和人）以時概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於輶，以（崔）恭代秉」。（按崔恭河北廣宗人）（明史一五九崔恭傳）

又如明史一八五侶鍾傳略云：

「侶鍾，（山東）鄆城人，爲刑部右侍郎，丁內艱，餽運艘載母柩南還，督漕運總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會當路方逐尹旻（亦山東人）黨，而鍾與旻爲同鄉，乃貶二秩爲曲靖知府」。

後來反對東林的齊、楚、浙三黨，顧名思義，即可知其爲地域性的結合。明史卷二三六夏嘉運傳云

「帝（神宗）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鈎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

而東林方面，也有所謂秦黨，明史二一六王圖傳略云：

「王圖，耀州人，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兄國，方巡撫保定。廷臣附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轂圖兄弟，會孫不揚起掌吏部，孫瑋爲尚書督倉場，皆陝西人，諸不悅圖者，目爲秦黨」。

並常因內部，利害衝突而自以鄉里分朋黨，明史卷二四五黃尊素傳云：

「（天啓初）東林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魏）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駁尙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

又明史二四四魏大中傳云：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又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

不過，反東林的齊、楚、浙三黨分立之時，乃是在萬曆末年將東林盡行逐出朝廷之後，而東林內部的派系分立，也是在天啓之初將齊、楚、浙三黨盡逐之後。換言之，兩黨都是在沒有外患之際，纔有內爭。在有外患之際，尤其是齊、楚、浙三黨附集於魏忠賢門下之後，內爭便成次要。因此，東林黨與魏閣黨人，遍於南北各省。美國人哈克爾 (Chases C. Hucker) 會就此作一統計，茲引述如下（註一八）：

地區別	東林黨 (百分比)	閩黨 (百分比)
南直隸	八九 (二八·〇%)	二九 (一三·六%)
江蘇	三七 (二·七%)	八 (三·八%)
江南	一九 (六·〇%)	二五 (一一·七%)
江西	二九 (九·一%)	八 (三·八%)
東北	二五 (四·七%)	一七 (八·〇%)
山西	三三 (一·〇四%)	三〇 (一四·一%)
陝西	二六 (八·二%)	四 (一·九%)
湖廣	一一 (三·五%)	九 (四·二%)
四川	四 (一·三%)	五〇 (一三·五%)
東川	一一 (三·五%)	九 (四·二%)
廣西	五 (一·三%)	

福	建	一六(五·〇%)
雲	南	二(〇·六%)
貴	州	二(〇·九%)
合	計	一(〇·五%)
		二二三人
		三一七人

從上表，可知兩黨是沒有顯著的南北之分的；不過，從東林黨以東林書院所在的南直隸人數最多，而魏黨則以魏閣家鄉北直隸人數最多，可見還是略具地域色彩的。如果以死於魏閣的高攀龍等十九人為東林代表，其籍里為：

南直隸：高攀龍、左光斗、顧大章、汪文言、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李應昇。

浙江：魏大中、黃尊素、丁乾學、吳懷賢。

湖廣：楊連、吳裕中。

山東：周朝瑞、袁化中。

江西：萬燝、劉鐸。

福建：周起元。

而以明史卷三〇六闡黨列傳所舉魏闡黨羽為代表，則其籍里為：

北直隸：魏廣微、馮銓、黃立極、崔呈秀、田吉、石三畏、劉徽、智鋌、霍維華、李恒茂、閻鳴泰、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孫雲鶴。

浙江：施鳳來、來宗道、劉志選、邵輔忠、孫杰、盧承欽、徐大化。  
南直隸：顧秉謙、劉應秋、倪文煥、楊寰。

福建・張瑞圖、楊景辰、吳淳夫、李夔。

山東・李蕃、李魯生。

河南・劉詔、門克新。

陝西・王紹徽。

廣東・梁夢環。

江西・曹欽程。

四川・張訥。

仍可見兩黨並無南北之別，而稍有省區性的偏向，即魏闔最恨者多為南直人，而其主要附從者則為北直人。

### 附註

(註一)「優秀份子流轉」之說，創自意大利人班累度(Vijfreds Pareto, 1848—1923)。參見浦薛屬現代西洋政治思潮，五十一年臺北正中書局版，頁八六—八八。優秀份子之所以流轉，除因個人之衰老死亡而起的新陳代謝外，主要係由時代的要求不同，與人才的供應有變。參看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Reinhard Bendix,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2—3.

(註二)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Ibid, pp. 3—4.

(註三) 史記卷五秦本紀：「(秦)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商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驟，驟其師傅。』於是法大明，秦大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註四) 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吳起……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却三者，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

悼王死，宗室大臣作戰，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戶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

(註五)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註六)漢書卷四十九晁錯傳。

(註七)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宦典職儀。

(註八)後漢書卷七十五袁安傳。

(註九)後漢書八十四楊震傳。

(註十)後漢書八十三黃憲傳徐穉傳。

(註十二)後漢書九十九竇武傳。

(註十二)後漢書九十六陳蕃傳。

(註十三)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劉淑傳。

(註十四)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李膺傳。

(註十五)後漢書九十二荀淑傳。

(註十六)後漢書八十六王龜傳。

(註十七)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范滂傳。

(註十九)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尹勳傳。

(註十九)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羊陟傳。

(註二十)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張儉傳。

(註二十一)同前書岑晊傳。

(註二十二)同前書陳翔傳。

(註二十三)同前書孔昱傳。

(註二十四) 後漢書九十八郭太傳。

(註二十五) 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檀敷傳及同書卷六十八度尚傳。

(註二十六) 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蔡衍傳。

(註二十七) 後漢書一〇八宦者列傳曹騰傳。

(註二十八) 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本紀。

(註二十九) 後漢書一〇八宦者列傳單超傳。

(註三十) 同前書曹節傳。

(註三十一) 後漢書九十七黨錮列傳李膺傳。

(註三十二) 後漢書一〇八宦者列傳張讓傳。

(註三十三) 楊聯陞，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二十五年十月出版，頁一〇六一）。

(註三十四) 沈括、夢溪筆談、卷廿四，氏族門第條。

(註三十五) 舊唐書六十五高士廉傳。

(註三十六) 舊唐書八十二李義府傳。

(註三十七) 王讜唐語林卷四。企羨類「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註三十八) 舊唐書八十二李敬玄傳。

(註三十九) 新唐書一七〇王鏗傳。

(註四十) 舊唐書一七三陳夷行傳。

(註四十一) 舊唐書一七二令狐楚傳。

(註四十二) 新唐書一八一李紳傳。

(註四十三) 舊唐書一五九路隨傳。

(註四十四) 舊唐書一七三李回傳。

(註四五) 新唐書一八一李讓夷傳。

(註四六) 新唐書一八二鄭肅傳。

(註四七) 舊唐書一七七崔慎由傳附父從傳，新唐書一一四崔從傳。

(註四八) 舊唐書一七七崔○傳。

(註四九) 新唐書一八二崔○傳。

(註五〇) 舊唐書一五五崔邠傳附鄆傳。

(註五一) 新唐書一九七循史傳薛元賞傳。

(註五二) 新唐書一六四王質傳新唐書卷一三二沈旣濟傳附傳師傳、又新唐書卷一六二韋夏卿傳附韋瓘傳。

(註五三) 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綽傳附仲郢傳及舊唐書一六八韋溫傳

(註五四) 舊唐書一六八封敷傳。

(註五五) 惟見新舊唐書合本傳。

(註五六)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牛僧孺奇士條。

(註五七) 杜牧、樊川集卷七牛僧孺墓誌銘。

(註五八)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二十九，襄州別駕府君事狀云：「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韓城縣，至今存焉」。

此所謂有功於北齊之司空，即爲白建。據北齊書卷四十白建傳云：「白建字彥舉，……武平七年卒，贈司空。」而新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白氏條列白居易，白敏中之先世云：「白建，字彥舉，後周弘農郡守。邵陵縣男。」兩者姓名相同，而官職不同。其間必有竄改附會。

(註五九)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六六至六七。

(註六十) 看通鑑卷二四四大和七年二月丙戌條及同年三月庚戌條，舊唐書卷一七三李紳傳及李珏傳。

(註六十一) 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大和七年三月條晁載之續談助卷三引。

(註六十二)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二禿角犀條、及同書卷三、杜邠公不恤親戚條。

(註六十三) 舊唐書一四七杜佑傳。

(註六十四) 新唐書一九白居易傳。

(註六十五) 新唐書一九白居易傳贊引。

(註六十六) 舊唐書一六八韋溫傳。

(註六十七)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二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頁五十三至七十。

(註六十八) 陳寅恪先生前書頁五十九。

(註六十九)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五。

(註七十) 歐陽修、歐陽文忠集瀧岡阡表。

(註七十一) 宋史卷二七七韓國華傳。

(註七十二) 宋史三一〇杜衍傳、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

(註七十三) 宋史二六五呂蒙正傳。

(註七十四) 宋史三二一呂夷簡傳。

(註七十五) 宋史二六五呂蒙正傳。

(註七十六) 宋史二六七陳恕傳。

(註七十七) 宋史三二一韋得象傳。

(註七十八) 王臨川集卷七十一、先大夫述。

(註七十九) 宋史卷四七一呂惠卿傳。

(註八) 宋史四七一曾布傳。

(註八十一) 宋史四七一章惇傳。

(註八十二) 宋史二九八司馬池傳。

(註八十三) 宋史三一〇李廸傳附承之傳。

(註八十四) 明史三〇八嚴嵩傳。

(註八十五) 明史二二三張居正傳。

(註八十六) Charles O. Hucker 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 159—160.

(註八十七) 明史二二三薛敷教傳。

(註八十八) 同前書于玉立傳。

(註八十九) 明史二四〇葉向高傳。

(註九十) 明史二四〇劉一燝傳。

(註九十一) 明史二四三孫慎行傳。

(註九十二) 明史二二六馮琦傳。

(註九十三) 明史二二四孫鑑傳。

(註九十四) 明史二二五文震孟傳。

(註九十五) 明史二四四魏大中傳。

(註九十六) 明史二二五劉宗周傳。

(註九十七) 明史二〇五魏忠賢傳。

(註九十八) 明史二〇六閻黨列傳田爾耕傳。

(註九十九) 明史二二八沈灌傳。

(註100) 明史二三二魏允貞傳。

(註101) 文秉先撥志始、卷上、頁四十一。

(註102) 明史二〇六王紹徵傳。

(註103) Charles O. Hucker, *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John K. Fairbank (ed), op cit. p. 159

(註104) 雙方的郡望、見後漢書各本傳及附傳。

(註105) 顏氏家訓、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四部備要本例言二。

(註106) 據新舊唐書各本傳。

(註107) 舊唐書卷十四憲宗紀上。

(註108) 文獻通考卷卅一選舉四引。

(註109) 宋史二九一宋綏傳附敏求傳。

(註110) 同註109。

(註111) 宋史二八三王欽若傳。

(註112) 按反對王安石變法之人，蔡京於崇寧元年立黨人碑，所載共一百二十人，崇寧三年又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將元符末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然其中多有擁護新法而與蔡京不善者，宋龔頤正嘗作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其有傳者三百有五人，然其書久佚。清人陸心源又作元祐黨人傳，然籍里事蹟，猶多不全。今依宋史及宋元學案。將未列黨籍之反對新法者加入，已列黨籍而不反對新法者剔除，開列其所屬路別姓名如文。

(註113) 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

(註114) 明史一六八萬安傳。

(註115) 明史三〇六閻黨列傳、焦芳傳。

(註116) 明史三〇八奸臣列傳嚴嵩傳。

(註117) Charles O. Hucker, *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John K. Fairbank (ed), op cit. P.158.